

朱德发文集

朱德发 著

第一卷

五四文学初探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五四文学初探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中国五四文学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五四文学新论

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

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

朱德发序评集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

古今文学通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朱德发文集

第一卷

五四文学初探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朱德发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德发文集:全10册 / 朱德发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209-07570-1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德发—文集 IV. ①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326号

责任编辑:李怀德

朱德发文集(第一卷)

朱德发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开(169mm×239mm)

印 张 23.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

ISBN 978-7-209-07570-1

定 价 498.00元(共十卷)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调换。(0539)2925888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余载有感 （代弁言一）

反智主义思潮猖獗的年代，上大学多读书一旦成了知识分子，便在心底潜滋暗长出一种原罪意识，每逢“灵魂里面闹革命”总要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王国”进行一次颠覆，以摘掉“知识有罪”的帽子。也许因为我资历浅知识少罪不大，于1974年夏秋有幸参加了全国十二院校《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内部教材）的讨论和编写。我们编写组遵照“教材要彻底改革”、“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阐述自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一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这段时间内，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反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斗争中的胜利，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当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①。如果说参与这种反智论教材的编写也算学术研究活动，那么我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的生涯就应从1974年算起，截至目下正好36年；但是能真正从著述中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发出内在声音的学术论文却是发表于1979年第5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上的《评胡适的〈尝试集〉及其诗论》，以及同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教学初探》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讲解》（上下）两书中我所承写的鲁迅作品解读的文章。尽管这些论文仍残留一些“左”的印痕，然而已基本摆脱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思维模式的桎梏，可以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与独立思考作出判断或参与争鸣了，这也是我以一个知识者的独立姿态跨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园地的开始。历史的曲折孕育着社会进步的种子，个人道路的曲折也积蓄着发展的动力。反观这三十余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之途并非平平坦坦、一帆风

① 《说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四川南充报社印刷厂1975年版。

顺,即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春天里也有“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时日。感受着或迎击着这种乍暖还寒的气候,我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力、智力与魄力、识力撰写了三十多年的学术史。我这所谓“学术史”,或许是“满纸荒唐言”,然而“谁解其中味”呢?

一、突出重围

没有困惑就没有“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就难以焕发学术激情,没有学术激情就不能进入研究状态,这条因果逻辑链的确是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生命驱动力。1971年“复课闹革命”我被推上大学讲台,为工农兵学员讲授“现代文学专题课”,只能跟“风”讲鲁迅、浩然等的作品和“样板戏”,配合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鼓舌呐喊,把诸多困惑挤压在心底,根本不能表述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社会良知和学术见解;1978年学界解冻,“大地微微暖气吹”,一方面我准备为本科生开设“五四文学研究”的选修课,一方面我参编了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具体撰写“五四文学革命”一章并责成我给全书通稿。为准备选修课和编写文学史,我几乎翻阅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较为广泛地阅读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有关史料、重要报刊和主要作家作品以及政治经典文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权威论述。通过反复比较与深入思考,我惊奇地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现存史实所展示的历史本真面影与以往文学史的叙述和政治经典的判断相差甚远,仿佛坠入历史迷雾,困惑重重,禁忌多多。面对历史吐真言还是遮蔽历史本相?这是对一个初入学术之门的学者的探索勇气和理论胆识的严峻考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克服心有余悸,战胜自己,于是我写下这样一段话以表当时的治学态度、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学术追求: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绝对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范围,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态度,但因受某些时期政治气候的左右,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猖獗,越发给“五四”文学本来面目的恢复,带来一些“老大难”问题。例如:文

^①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民主主义呢还是马克思主义？鲁迅和茅盾的新文学观到底属于什么思想性质，胡适和周作人的革命文学主张究竟应该怎样作出科学的历史评价，《狂人日记》的主导思想倾向是人道主义呢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冰心的“问题小说”的思想意义到底该作出何种估价，等等。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为这些问题的探究创造了良好的时代条件。遵照党的“双百”方针和解放思想的精神，为适应现代文学史的教学需要，我试图从原始材料出发，尽力从一些脱离史实的僵化的看法中挣脱出来，对“五四”文学一些问题作了点力所能及的蠡测……^①

还历史一个真实面目，仅有突围的勇气和胆识是不够的，尚需有点攻坚的韧性和吃苦的耐性。我带着五四文学革命的诸多敏感而沉重的问题如同怀着一团团火，燃起我的生命激情，引发我的学术欲求，白天泡在图书馆埋入资料堆，晚上闭门谢客开灯夜战，孜孜不倦地在简陋的斗室里苦钻深研几个春秋，终于草成了一批万字以上的学术论文，并分别寄给国内有影响的报纸杂志，得到它们的鼓励与支持；尤其使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是《文学评论》等国家级刊物一些编辑部的友人，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学界新手毫无“成见”地尊重我的探索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期连续录用拙稿，《文学评论》、《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量级国家刊物在四年内发表我独撰的8篇学术论文，给我的研究以莫大的关爱和扶持，从而奠定我一生献身学术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对五四文学运动集中攻坚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形成《五四文学初探》和《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两部专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和1983年先后出版推向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不想对这些突出重围、开拓创新的研究成果作出王婆卖瓜式的自我评价，拟引用几段学术界的评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文学初探》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们分别探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几个代表人物的文学主张和一些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其要旨在于解决‘五四’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重点和疑点问题。该书的主要价值，正在

^① 朱德发：《五四文学初探》，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2～303页。

于它对这些重点和疑点的突破。”^①“本书所论述的大都是‘五四’文学革命有争议的,或被湮没的历史问题。它基本上能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丰富的史料出发,对一些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讨。既不是简单地套上一些公式和原理去分析复杂的文学现象,又不是无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实际贡献而去裁判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从大量的事实中形成观点,得出比较切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不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或者对某些倡导者的文学理论主张以及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都作了比较具体深刻的分析和符合实际的评价,并对某些有分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有根有据的独到见解。”^②“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的学术界与极左思潮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先生面对观念僵化、方法陈旧、资料匮乏的学术困境,以异乎寻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毅然冲到学术禁区的前沿,以‘五四文学’为突破口,连续发表长文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周作人的文学主张、《狂人日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等一一论证,稍后结集为《五四文学初探》出版。该书匡正和澄清了‘五四’文学研究中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其中尤富思想冲击力的是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的探讨。著者一反以往研究界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出发对‘五四’新文学的定论,不同意‘五四文学’革命从1918年开始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来领导的说法,并通过‘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特定国际历史背景及主导思潮,《新青年》的实际思想倾向,以及‘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的剖析和考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呈现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它是各种‘新思潮’的混合体,但在构成这一复杂形态的带着各自不同色彩的新思想的诸方面中,‘民主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主要方面,因之也占有主导地位’。当时的理论界尚在为‘异化’问题以及人道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等问题争论不休,朱先生则以自己‘事实加雄辩’的批评实践率先对时代的要求作了掷地有声的回答。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性质和指导思想,既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

① 孙昌熙、魏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② 赵耀堂:《内容说明》,《五四文学初探》,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问题,也是一个富有原则性的方法论问题,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对‘五四文学’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做出怎样的估价,而且直接影响到对‘五四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时期的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做出怎样的评判。显然,这些‘初探’的价值与意义已超越了现代文学史领域,而成为整个思想启蒙的有机组成部分。”^①与《五四文学初探》同期问世的《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似可看成对五四文学研究的补充与深化,也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茅盾前期文学思想的专著”,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茅盾前期文学思想作了深入探讨,如茅盾‘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五卅’前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前期的新小说观、茅盾与白话运动等,探讨了鲜为人论及的课题,拓宽了研究领域”。“《散论》的作者具有比较开阔的研究视野,能站在历史的高度考察文学现象,并注意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分析。没有把茅盾前期文学思想作孤立的封闭式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和世界文学潮流中审视、评析、归纳、综合,从多维的社会空间进行全面考察,既注意到研究对象的时代规定性,又看到它的历史继承性、延续性。”^②

研究旨在探讨真理、创新趋优、言说真话,然而要做到这样又谈何容易?通过对五四文学的生命体验与理性感悟,使我的文化人格里注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增强了“诚”与“爱”的人性内涵,提升了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激起了学术生命力的爆发力。正在我满怀豪情沿着“五四”文学的研究思路、价值取向以及现代学术传统向现代中国文学深广天地掘进之际,1983年骤然吹起“清除精神污染”的狂风,自由开放的学术园区回荡起“反右”、“文革”的阴声恶语。此时,我为五四文学指导思想、胡适评价发出的个人声音与一位同调老友便遭到“全国共讨之”的厄运,幸亏这股“狂风”及时被遏制;虽然这场狂风造成的灾害没有危及我的学术生命,但是它给我的心灵留下的阴影时刻在暗示着我:学术探讨没有绝对的自由,在现行体制内的人文科学研究切忌硬碰“政治高压线”,离它越远越安全;在安全的文化圈里开垦自己的学术园地,栽培生命之树,结出智慧之果。这种以退为进的

① 《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笔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② 张学军:《茅盾研究的新收获》,《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

人生策略看似有点世故圆滑,实际上它给我的学术研究带来更大的效果,使我以理智破解困惑、从困惑中增长智慧,光靠冲动与激情是难以在科研阵地上坚持永远进击的韧性精神与锐意创新的恒久毅力的,也难以于不断的突围中提升学术境界。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继‘初探’之后不到四年的短短时间里,朱先生推出了观念新颖、资料翔实的《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这部近50万言的著作作为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重要的‘五四’文学断代史,以追索‘人的文学’观念的来龙去脉为核心,上承1917年之前的近代文学,下启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文学‘转向’,纵横捭阖,气势雄势,为新时期现代文学史观的完型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其中尤富学术史意义的是著者将研究对象视为一种灵魂的存在形式,‘一种能激活的生命体’,它凝结着历史主客体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内涵。因此在这里,文学史写作实际上成为史家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对话,成为当代学者的学术灵魂与历史上的审美灵魂圆融无间的沟通。后来在总结自己的文学叙述实践的经验时,朱先生特意将这种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史识’称为具有统摄功能的现代文学史之‘史魂’。马克思曾极精彩地说过这样的话: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因此,‘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朱先生孜孜求索的‘史魂’不正是这种‘人’的活动吗?应该说这既源于从‘五四’先驱、从历史深处汲取价值资源的思想动因,也源于他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环境与文化格局中不断投射新思想、新困惑的需要。在1995年出版的《五四文学新论》(山东文艺出版社)中,著者在此前从政治社会学层面转向从文化意识层面探索‘五四’文学精神的基础上,进而从生命意识上寻求‘五四’文学精神的精髓与底蕴;并将‘五四’文学与现代学术的建立、城市意识的觉醒、中西文化渊源等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既扩大了‘五四’的内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90年代学术界新的研究范式与价值取向。”^①正是突出重围的历险才使我的学术生命中凝成根深蒂固的挥之不去的“五四情结”,从中生发出的学术张力和创造动力并推动着我进入一个新的逻辑层次,对现代中国文学展开纵横捭阖的探究。

^① 《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笔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二、纵横求索

五四文学研究是我起飞的基地也是我的学术生命根源，但它并不是我终生追求的学术价值目标。因为科学探索总不能停留在一个基点与一个水平上，要不断求索、不断发现、不断开拓、不断前进，哪怕探索中有所失误甚至陷于“雷区”也要在所不惧，朝着既定的目标追求下去，总会有一天在你失误之处或“雷区”隐蔽处发现真理之光和原创之理，或者体验到人生真谛和审美真趣，逐步撕开眼帘被蒙蔽被欺骗所出现的学术假象和知识虚幻。鲁迅曾以金睛火眼识破瞒与骗的文艺并从瞒与骗的大泽中拯救众生，虽然我缺乏鲁迅睿智的识力与超群的魄力，但是以鲁迅为榜样在学术领域求真打假的雄心与毅力还是有的，不满足一孔之见或孤陋寡闻而立志在学海中纵横求搜获取新知卓见的决心与恒力也是有的。况且，现代中国文学是生成于中外古今文化纵横交错的坐标系上，不论文学运动、理论思潮或者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无不与中外古今文化形成的深广语境与生态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中外古今文化通过不同层次的冲撞、交汇、对话结成了一张立体型的深不可测、广不见边的大网，那你选择的或大或小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象就是大网上的一根“绳子”或一个“结”，无论是解开一根“绳”或者要剖析一个“结”都要触动这张大网，这就把我们的宏观、中观或微观的所有文学研究纳入一个错综复杂、宏阔深邃的文化背景之中。基于上述认识与追求，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的研究视野由今及古、由中向外，既把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把现代中国文学视为古代中国文学必然的转型，于是便从文学本体出发在“史通”与“史识”上下工夫。所谓“史通”，主要指通过独撰、合著或主编《中国五四文学史》、《中国抗战文艺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六十年》、《中国情爱文学史论》、《中国山水诗论稿》、《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等断代史、专题史、流派史、通史，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三种形态文学史的联系，打通了古代中国文学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联系，也打通了中外

文学史的联系,并通过对中外古今文学史流变的粗略性的整体把握,从其相通性与差异性的文化特征和美学特征中发掘世界文学建构的规律与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轨迹。所谓“史识”,一般指处理审读史料中而获得的“史识”,或者说是洞见规律性的思想,由资料中抽绎出的逻辑结论,体现出“资料的实证性与思维的超越性的统一”^①;这里特指文学史观念(即文学史理念),在我看来,“文学观念是构筑一部文学史的关键,即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念越正确文学史就越富有真实性和科学性”^②。既然文学史观念是重写文学史的关键,是统摄文学史编著的灵魂,是文学史创新的本质规定,所以在我书写或主编的文学史中始终把追求文学史观念的更新放在首位,每部文学史著作我总要写个“导论”或“前言”,开宗明义地表述我的文学史理念以及依据此理念对整部文学史所作的框架设计与各章节的务实求真出新的要求。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的“前言”我这样强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思想和‘文学是人学’的观念,着重从文学与人(包括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小我与大我等)这个视角来审视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所编著的文学史应是人性解放的形象史,人生奋斗的形象史,民族解放的形象史,阶级斗争的形象史,现代国人灵魂的衍化史。”^③尤其纵贯中国几千年文学长河的情爱文学史与山水诗史的梳理与叙述,我以现代人学意识与美学意识相融合形成的文学史观及其价值尺度,对情爱文学的人性内涵和审美意蕴、山水诗的美学意境和丰富诗性,既进行了开创性的“史”的描述又进行了独到的“论”的阐释。我对《中国山水诗论稿》的编著意图作了这样的概述:一是“以古今山水诗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中华民族的山水审美意识,总结山水审美经验,揭示山水审美主体的心理机制和独特的艺术思维等,阐释历代山水诗人的审美体验、审美层次和审美能力”;二是“把山水诗这种艺术形态和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我们将重点放在它的美学意义、文学史意义、文体史意义的探讨上,但并没有忽视它的自然科学、人文景观、绘画艺术的价值,对其宗教文化、人类文化、哲学诸方面的内

① 陈鸣树:《文艺学方法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68页。

② 孙昌熙、朱德发:《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③ 同上,第4页。

涵尤为关注,并予以较深入的阐释。正是从多视角进行透视,便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我们的编著意图,即它似一部山水诗美学,然而它的学术价值又不仅仅限于此,也许还蕴含着一定的文学史、诗歌史、文体史、山水文化史、宗教哲学史、山水科学、园林艺术等某些意义”。^① 研究实践告诉我们,文学史观形成的编著意图能否实现,有待于研究成果的质量来证实和体现;研究成果能否贯彻编著意图且达到相当的学术创新层次,有待于社会历史的检验与众家学者的评说。

在纵横求索中问世的“这些文学史著,有的是为了大学中文教学而作,有的是为了学术的探索思考,但每一种著述都鲜明地体现着强烈的创新精神与突出的个性意识”;特别是“朱先生领衔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最早向这两种模式(一是王瑶模式,一是丁易模式)进行突破尝试的史著。该著力图将王瑶模式与丁易模式糅合起来,尽量包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与优长,构建起一种综合性的文体与作家流派(群体倾向)相结合的体例”。“在这个意义上,朱先生的史著不啻是开风气之先的”^②。《中国情爱文学史论》的出版引起《文艺报》的关注,发表了题为《爱与美的探索》的评论,说这部著作“从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今的情爱——爱情文学名著进行了较为系列的纵向考查与研究,于纵横比较中探索了情爱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及总体审美特征,并作出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评价”;在方法论上“作者放弃了传统的作家作品论的叙论方法,而选择在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对情爱文学的个体进行研究,使个体在整体系统中成为有机组成部分并显示出较深沉的理论意蕴来”^③。有的评论者称赞《中国情爱文学史论》一书“以极为严肃的学术态度,以史的纵向序列和论的横向归纳,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爱情现象的全面归结与分析,对其所包含的社会与美学内容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讨与透视。综观全局,这部著作不但可以视为一次十分有益的首举尝试,而且的确显示了相当的理论水准和学术价值”;“尤其具有填补空白的

① 朱德发主编:《中国山水诗论稿》,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2页。

② 《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笔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③ 祝鲁:《爱与美的探索》,《文艺报》1991年11月23日第6版。

意义”^①。《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出版后发表评论说,“这是一部具有拓荒性的文学专史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将我国的现代纪游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问世后引起的社会反响较大,仅1993年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了6篇评论文章,从《新文学流派研究的新视野新拓展》、《理论开拓与现象研究的深度契合》、《广度、深度、力度的有机统一》、《逻辑思维的新高度:文学流派研究的形而上思考》等标题上,便显示出这部“文学流派论纲”的价值和特点。正如最近有的评论者从比较的角度所论述的:“他的第一部文学思潮流派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在1990年代初问世,不同于已有文学思潮流派研究成果之处,就在于上述文学史研究的坚实积累和勇于质疑创新的文学史视野,课题研究的突破性追求十分鲜明:一是跳出了这一时期普遍集中在思潮流派各种‘史’的描述性的研究套路,大胆探索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流派的某些规律,积极思考和建构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理论体系。近40万字的论著以探讨文学流派的‘形态论’、‘思潮论’、‘规律论’为主体构架,旨在寻求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多彩群体的自身理论系统。二是抓住了文学思潮中最为活跃、核心的文学流派为切入口,并以集中探究文学流派的‘美学形态和艺术风貌’、把握文学流派的‘构成要素’为中心点,将文学流派看做是‘一个极为活跃的生命流体’并寻找其基本特征,从而深化了文学流派本体的认知,也为文学史思潮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条件。”“同许多文学史家一样,朱先生的文学思潮流派研究自然也是个人化的解读和探讨,但是他的理性和诗性智慧结合的研究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我们对此可以认同,可以商榷,可以超越,却无法回避他所带来的思索。”^③

三、重在建构

“突出重围”也好,“纵横求索”也好,这都不是我致力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宗旨,仅仅是策略性的举措和行为,其目的是想在自己耕耘的学术园

① 齐飞:《严肃的探索 有益的开拓——评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爱情文学的专著》,《天津书讯》1991年版。

② 朱晓云:《纪游文学的拓荒之作》,《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③ 《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笔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地里有所收获有所建树。虽然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既要解构又要建构,但我认为解构只是手段而唯有建构才是最紧要的,所谓“突破”所谓“超越”终究要落实在建构上,即使那些高喊“解构一切”、“颠覆一切”的先锋学者也不想把自己的学术园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沙荒。建构固然重要,没有一个学者不想有所成就,可是要有所建树并不容易。我以为研究主体至少应具备这样一些现代知识者的人格素质:一是提高理性自觉,抓住时代机遇。日益开放、宽松、民主、和谐、富裕、昌盛的社会大环境,各国文化交流日趋信息化、高速化、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日益敞开的广纳博取的宽容胸怀,都为学者人格的塑造、“现代学术精神”的建构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正由于一批具有理性自觉精神的学者抓住了这个良好机遇,才为“现代文学”的真正“学术化研究”开创了新格局与新景观。二是坚持科学的治学态度,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探讨和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的本来面貌和内在规律,使自己的学术思维保持永久的活力,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既能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特别要敢于“破门而出”,冲决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传统界限或断代,真正按照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内在机制和基本规律重新规划“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以体现出当代学者勇于探索的锐气和科学求是的精神。三是一个“真学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方式或价值根基,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而且应树立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治学的坚定信念,见到发财之道不动心,听到官场升迁不走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学术桥,只要能施展我的才能实现我的选择就感到其乐无穷、无限欣慰;只要能通过“现代文学”研究来破译历史和道法的权力结构,化解文本语言结构方式以维护全面的人性、人类完整的感性,从而释放审美主体的生命活力以争取精神完善和自我超越,于论文或著述中发出的是历史的真言和个人的真声,那就心满意足了。四是“学术本位”的执著追求从骨子里决定了“真学者”研究中的特立独行、耿直率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人格,既不怕受冷落也不怕遭围攻,为了探求学术真理、繁荣学术研究,哪怕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因而在“真学者”眼里学术无禁区,学术无国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在布满了陷阱的“现代文学”领域也敢于大胆驰骋任意开掘,不戴任何有色眼

镜或褊狭眼光去“重新解读”、“重新评估”和“重新把握”，不管什么所谓“经典”、“大师”，也不管什么所谓“糟粕”、“谬种”，都要以“真学者”的心灵去感受去体悟去认识，从而作出与“历史”结论或“权威”话语相通或悖反的结论。五是与这种学术品格相一致的乃是学者们的日常生活追求，足现其可贵的精神境界，即不论在顺境里或逆境中都能经受住考验，且把逆境视为人难以回避的本体性存在，心不慌眼不跳，安然无恙地承受着，表现出一种正常的生活心态和乐观进取的情调。有位学者这样表述自己的感受与认识：“本来人生在世只活一次，已属无奈；有人偏偏又被区区官冕压得一点都不敢潇洒，实在不值。相比之下，学人则洒脱得多，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尚能说话，再添一支笔，一张纸，一叠书，一颗独立思考的大脑，便能演绎人生的风味与丰采。只须你愿坐冷板凳，静得下心，沉得住气，铢积累寸，唯问耕耘，何愁不获？”（见夏中义《谒梁启超书》）

并非说我是这样的“真学者”，更不敢说我已具有现代学人的优秀素质，而是说我正是在努力学习“真学者”的治学态度、优秀品格、学术作风、价值观念、献身精神甚至生存方式的过程中，为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而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在建构上有所创新，这主要体现于两个大的层面：其一，文学史的建构。我以“重写文学史”的精神，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和学术智慧的基础上，从体式与内涵的合逻辑地结合上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五四文学史》、《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中国情爱文学史论》、《中国山水诗论稿》、《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等史论兼具的求新著作，并多次“新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二，文学史理论与文学流派理论以及文学研究思维学的建构。《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1997年）、《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2002年）、《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2003年）、《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2010年）这四部专著是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与新文学流派学以及文学研究思维学的理论反思与理论建设，并把我的理论追求、设计、体系概述在每部著作的“引言”或“绪言”中。为精简篇幅这里仅将《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绪言》的一段话摘录如下，由此可见一斑：

本书要探讨的既与一般意义的“文学史学”有关又有所不同，也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相关又有所区别，而是要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以“现代中国”来限定“文学史学”与以“中国现代”来规范“文学史学”，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其中有诸多差别（详见第一章）。我们无意对大半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辨识梳理，著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或学术研究史，而是想重点联系近20多年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践和21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趋向，从文学史哲学上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重建应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开拓21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新局面。爱因斯坦能借助逻辑推理力量即“人的头脑应当独立地把形式构造出来”创立了“相对论”，我们虽不是天才的大科学家、大哲人，但是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普通研究者，面对重大理论命题总是能焕发出一定的思维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关于如何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思路或者说是总体想法：首先，以国家观念为理论基点，框定一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范畴，在时空维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仅涵纳了现代中国肇始以来所有的文学类型和文学样态，而且明确规范了“现代中国文学”不能急于进行“历史终结”。21世纪现代中国文学仍在延展，同时也把“现代中国文学史”总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关联性及其各自的面貌特征作了探索。其次，“文学史学”的任务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不同角度，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和编纂必须遵循的原则原理、思维规律、价值规范、框架结构、话语系统等，虽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各持己见、想法各异，但是总能找到趋同点，形成一定共识。如果文学史学科是重构过去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的“想象的共同体”（吉登斯语），那么作为凌驾于“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之上的“文学史哲学”就必须有一些研究者所认可的普遍原理和基本规范。在我看来，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核心理念即文学史观应似“人的文学”，它既能折射出现代中国各种形态文学的本质规定，又可作为中心思想线索把现代中国文学连接成有机的整体。在核心文学史理念统摄下，现代中国文学

通史的本体系统大致由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文学创作形态“三大板块”及其相互之间纵横交错的张力关系构成,而文学创作形态乃是文学史的躯干,不管采取何种逻辑框架或体例结构都离不开文学史客体这“三大板块”。“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毕竟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而在客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要建构什么性质与样态的文学史关键在于研究主体的优化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主体应自觉遵照创造性思维规律和发现逻辑机制。既要在文学史资料的搜求与辨识上下苦功夫,又要在文学‘史识’的发现与创新上下深工夫。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是与时俱进的,在当下全球化的历史文化语境下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作为研究主体既要把传统的文学史眼光转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学术视野,又要坚持现代化与民族化辩证统一的价值规范以及历史的审美的价值尺度,将现代中国文学置于“中外古今”纵横交错的价值坐标上作出公正、公平、合理的科学评判;既要把经典文本解读作为文学史创新的源头活水而自觉地进行文学史释义,又要通过文学史话语实践来建立属于时代又属于自己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崭新话语系统;既要自觉地在研究实践中不断调整或更新“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格局,又要积极地将“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纳入真正的学术轨道;既要敏锐觉察并排除“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非智因素,又要及时总结“重写文学史”文本的经验教训。这既可以使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成为一种可能,也可以使“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在写作实践中得到验证、充实和升华。以上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建构的逻辑系统、焦点问题、学理创新以及实践预期效果作了粗略勾勒和蠡测。

当我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理论和新文学流派理论以及文学研究思维学的探索与建构,通过不同渠道(或给研究生讲授或报刊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流向社会的时候,引起同行专家和青年学者的关注和评述,尽管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是他们的评说和见解既是对我理论思考和理论构建的匡正与补充又是对其严格的检验与接纳,因而我相信同行专家和青年学人的评价是严肃认真的,比起笔者的“自卖自夸”总是要公正得多、客观得多、审慎得多。